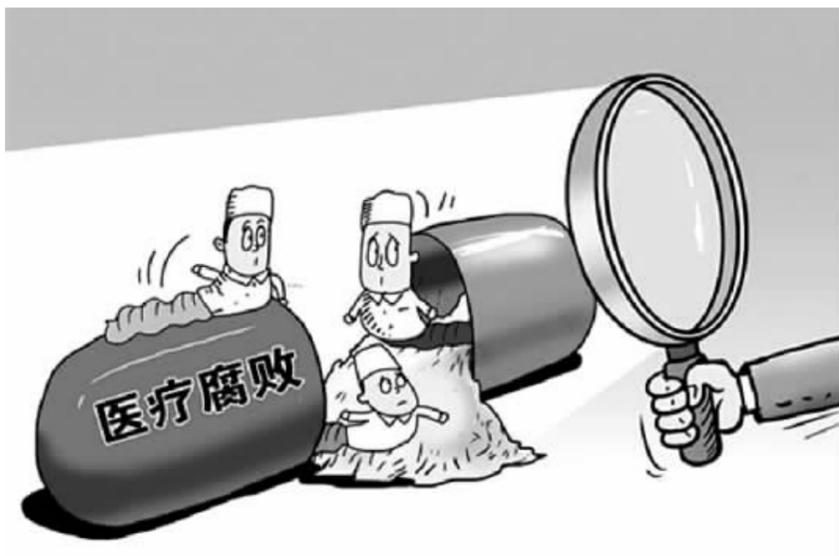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脈醫療亂象

有實力、守規矩的民營資本想進入醫療領域遇到種種體制機制障礙而難以進入，部分劣質民營醫院，通過不規範宣傳來牟取暴利。在醫療領域供給側矛盾的催化下，層出不窮的惡性傷醫案件已經成為嚴重撕裂社會的傷口，造成医患關係嚴重對立。一系列醫療突發事件表明，多年以來由於醫療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醫療亂象，正在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醫療供給側改革迫在眉睫！



■ 滕素 張海冰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

從年初的“白衣女怒斥辱罵”，到最近的“魏則西事件”和廣東陳仲偉醫生遇害事件，都表明中國醫療供給矛盾異常突出。相對於廣大患者剛性增長的醫療需求，中國醫療資源不但總量供給嚴重不足，而且供給結構扭曲，一些供給嚴重短缺的領域被低端劣質供給壟斷。大城市的大醫院集中了優質醫療資源，卻無法滿足患者的就醫需要，導致看病難的問題常年無法解決；被公眾寄予很大希望的民營醫療領域，目前卻存在嚴重的逆向淘汰：有實力、守規矩的民營資本想進入醫療領域遇到種種體制機制障礙而難以進入，部分劣質民營醫院，通過不規範宣傳來牟取暴利。在醫療領域供給側矛盾的催化下，層出不窮的惡性傷醫案件已經成為嚴重撕裂社會的傷口，造成医患關係嚴重對立。一系列醫療突發事件表明，多年以來由於醫療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醫療亂象，正在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醫療供給側改革迫在眉睫！

供給總量不足 供給結構不合理

經過 60 餘年的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條件顯著提高，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到 2015 年增長到 76.34 歲，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尤其是 SARS 疫情發生之後，中國每萬人口醫院衛生院床位數、每萬人口執業（助理）醫師數等指標均大幅上升。但是中國的醫療資源供給在總量上仍然處於不足的状态。中國的人均衛生費用僅為美國的 3.2%，醫師密度為美國的 60%，護理和助產人員密度為美國的 15.4%，醫院床位密度與美國相當，但是僅有日本的 28%。

從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分析，醫療供給不足的原因主要是資源約束和制度約束兩個方面。資源約束是指在總預算有限的前提下，

政府無法在短時間內在醫療領域投入更多資源。醫療制度供給約束一方面是行政限制使得社會資源無法順利進入醫療領域擴大供給，另一方面是分配機制扭曲，使得已經進入的資源無法得到合理的報酬，對資源給出負面信號，導致資源流入不足甚至流出。

中國醫療服務領域的供給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從地域來看，優質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發達地區，鄉村和欠發達地區供給明顯不足，甚至成為劣質供給濫的“災區”。在很多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基層醫療要么是空白，要么交給素質很低的“江湖醫生”，患者的權益很難得到保障。同時，由於醫療衛生知識的匱乏，導致一些假假藥在農村泛濫，對群眾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從產權來看，優質醫療資源還是主要集中在公立醫院，並向大城市大醫院集中，導致患者“一號難求”，大城市的公立醫院不堪負荷。民營醫院的優質醫療資源供給明顯不足，甚至成為醫療欺詐的多發地帶。與此同時，一些規範經營的民營醫療機構卻面臨重重困難，甚至難以為繼。而少數高端民營醫療機構儘管能夠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供給，但是數量太少，價格也只有少數富裕人群能夠承受，對改變醫療資源供給結構扭曲的狀況作用有限。此外，在中國醫療資源供給總量不足的情況下，由於“特權醫療”的存在，使得普通患者能夠得到的醫療資源供給被進一步壓縮。據報道，2006 年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奎曾披露中科院調查報告的數據，政府醫療投入的 80% 為 850 萬以官員為主的人群服務了。儘管這一數據未能找到更為權威的出處，但是特權醫療、“豪華干預病房”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

醫療供給質量偏低 供給價格形成機制扭曲

中國醫療服務的供給質量整體偏低，在農村、偏遠地區，在一些劣質醫療機構，醫療

服務的供給質量還會更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一個行業供給質量的惡化，一般是因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缺少合格或優質的要素供給，因處於壟斷地位而缺乏改進質量的動力，由於信息不對稱誘致的以次充好。

無法得到合格或優質的要素供給，導致醫療服務供給質量惡化。在目前中國的醫療服務領域，農村和偏遠地區的供給質量低下，往往是因為得不到優質要素供給造成的。即使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其遠郊區縣也存在著缺醫少藥的問題。北京市人大進行的一次調研顯示，在農村特別是遠郊山區，基層衛生工作者引不來、留不住的情況普遍存在，藥品和報銷標準也與城鎮地區有較大差距，“缺醫少藥”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

部分大城市的大醫院，佔據了大量優質醫療資源，實際上處於壟斷地位，導致供給者缺少競爭，從而缺乏改善質量的動力。在優質資源過度集中於部分公立大醫院的情況下，公立醫院的經濟地位接近於壟斷，在這種情況下，公立醫院缺乏改善服務質量的動力，也會導致患者看病時遇到態度惡劣、治療不細緻等情況。

醫療服務的特點之一是信息不對稱，供求雙方（医患雙方）無法展開有效博弈，導致供給方有機會以次充好牟取超額利潤。醫生掌握專業程度很高的醫療知識，同時也掌握著病人的全部檢查結果等信息；病人不可能掌握與醫生對等的知識和信息。而醫生的服務水平和結果，將直接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乃至生命安全，這構成了醫療服務的高度不對稱性。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絕對權力”，只要病人決定接受醫生的治療，醫生就擁有決定病人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劣質醫療資源就可能利用這種不對稱性佔據市場，這是以莆田系為代表的部分劣質民營醫療機構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出現過“手術進行過程中加價”的現象。

從銀行的角度來看當前的宏觀經濟

■ 向松祚 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上接 0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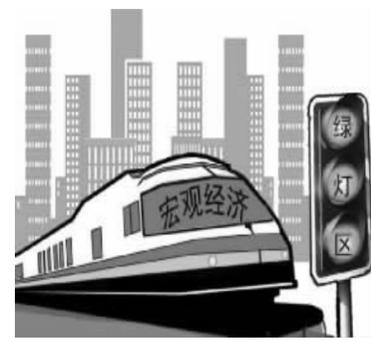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怎麼去認識中國經濟的問題，我講的第一個觀點：我們今天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必須從總量的數據轉到結構性的矛盾，如果我們不去重視這些結構性的矛盾，我不能說中國經濟崩潰；現在說中國經濟什麼崩潰，硬著陸，那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能說這個話。但是崩潰有不同的方式，硬著陸有不同的方式，風險總會有人承擔，這種結構性的風險，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一旦爆發出來，一旦暴露出來，誰來承擔這個風險？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去仔細地研究。

近日《人民日報》權威人士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判斷，我認為這個分析判斷是很中肯、很客觀的。果不其然，在這篇文章里面他已經預測了，他說道幾天中央還要專題研究供給側改革。日前新聞聯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最新一次的會議，專門研究供給側的改革，講得非常非常清楚：中國經濟今天的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結構性的問題。這里面大家注意，這個新聞公告里面這些話，我認為講得是非常非常嚴厲的，實際上對供給側結構改革很不滿意；然後專門講到四句話：不能因為包袱重而等待，不能因為困難多而不作為，不能因為有風險而躲避，不能因為有陣痛而不敢。為什麼中央下這麼大的決心提“三去一降一補”，難道中央判斷錯了嗎？而且這個判斷不是最近剛提的，已經提了兩三年了，所以我們今天判斷中國經濟政策的走向，或者我們判斷中國經濟的問題，我覺得應該回到或者應該统一到如何解決中國經濟結構性的失衡，或者叫結構性的矛盾。會議里面專門講到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說得非常清楚，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我想對於我們每一個行業來說，都應該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而且說得很清楚，當前必須要重點推進

“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所以中國經濟的問題，不是增長速度 CPI 多少、MR 多少、GDP 多少，這些大而化之的數據是一個平均數，這個平均數掩蓋了內在的結構性的大麻煩。這個話我想已經講到頂了，已經是最嚴厲的用詞。所以我认为中國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確實我們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從我們商業銀行來看，現在商業銀行說得很直白一點，那個快速增長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第二，所謂的 CPI 並不能反映中國真正的通脹情況。我從來不同意統計學的 CPI 能夠反映中國通脹的情況，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通脹它的大部分的構成要素是製造業的產品，但是真正現在影響老百姓生活的最重要的幾大因素其實並沒有包括進去，或者在里面包括的因素非常小。比如說房地產、教育、醫療。這些因素在 CPI 里面根本沒有得到任何的反映。它能夠反映通脹嗎？我們學經濟學，其實古典經濟學對通脹的定義是對的。古典經濟學角度講的人們生活的指數，或者叫生活的痛苦指數的變化程度，不是所謂的 CPI；我們今天的 CPI2.3%，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講就是通脹了。但是我們談通脹不能只談那幾個行業，不能只談傳統製造業，不能只談工業產品、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我們今天平心靜氣，今天老百姓從城鎮到農村，生活壓力最大的不是買一個蘋果手機，也不是買一個汽車，而是能不能買到一個像樣的房子，能不能上到一個像樣的幼兒園、小學、中學和大學？得病以後能不能有一個好的方便的醫療服務？這才是今天影響老百姓生活最嚴峻的最麻煩的問題：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上學貴。

北京的學區房絕對是極其荒謬的，全世界很難看到這樣的現象。全世界都有這樣的現象，但是像北京這樣極端的也是不多的。然而我們要換句話說為什麼中國沒有那么多好



的小學、幼兒園呢？全國幾乎很多城市房子蓋得非常漂亮，但是你在這些房子中間找不到一個像樣的幼兒園，找不到一個像樣的診所。這不是很奇怪嗎？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CPI 怎麼能夠反映真正的通脹？實際上真正的通脹，如果把这些因素考慮進去，絕對不是 2.3%。今天我們用這個數據去街上問老百姓，說中國的數據沒有通脹，你說老百姓相信嗎？所以我們必須要綜合地考慮中國現在的這種貨幣信貸高速擴張。大規模擴張這種背景下所隱含的極其嚴重的通脹問題，雖然 CPI 沒有反映，但是現實是非常殘酷的，何況我們今天的 CPI 也部分反映了通脹。我們的食物漲了 7.4%——如果單看食品這一塊，7.4% 已經是相當嚴峻的通脹了。對低收入階層——低收入老百姓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所以我們靠這種大規模的貨幣擴張、貨幣刺激、信貸刺激來稳增长，能穩得下去嗎？弄不好我可以非常嚴肅地警告，中國弄不好有可能出現嚴重的通脹。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如果我們相信經濟還有規律的話這就不是危言聳聽。

第三個觀點，中國今天面臨最大的風險之一就是高杠桿的風險。高杠桿就是高負債；高杠桿多少杠桿是高？我剛才請教大師兄，請教

由於醫療體制改革不到位，中國醫療服務領域的價格形成機制嚴重扭曲。比如，由於國家對公立醫療機構實行價格管制，因此其名义價格普遍較低，但患者實際付出的價格要高得多：一方面是號販子等灰色中介市場提高了醫療服務的價格，另一方面，患者灰色支出提高了醫療服務的实际價格。由於對醫療服務定價過低，使得“以藥養醫”、“以械養醫”的現象難以根除，由此導致大量誘導需求和過度治療，實際上也提高了醫療的实际供給價格。

而民營醫院在獲取了自主定價權之後，不規範收取高價的現象也很普遍。最為典型的就是莆田系醫院，現在在百度等搜索引擎參與競價排名來獲取患者導入，為此支付的成本最終都將進入患者的治療費用。據媒體報道，上海某男科醫院通過競價排名帶來的患者，還未開始看病，其“到院成本”就已經將近 4500 元/人。可以想見，這些費用都將在患者身上收回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破題醫療行業難題

由此可見，醫療服務領域的供給總量、供給結構、供給質量、供給價格形成機制都存在嚴重的問題，是供給側矛盾最突出的領域之一。為了增加醫療有效供給，改善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降低供給價格，一方面通過放寬供給側約束，解除要素供給抑制，讓人才、土地、資金、技術、管理等要素能夠有序流入醫療服務領域，解決供給總量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市場規則和監管體系，形成優勝劣汰的正向淘汰機制，促進新供給和優質供給形成，淘汰劣質供給，解決供給側結構問題。具體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建立起“遵章可入”的醫療服務行業准入規則。進入規則不透明，是醫療行業目前面臨的最大供給約束。儘管國家已經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勵民營醫院發展，但是社會資源如何進入醫療行業，仍然沒有明確的規章制度可尋。連台灣著名企業家王永慶創立的長庚醫院落地大陸的過程都歷經坎坷，其他的中小民間資本可想而知。因此，政府應當建立明確有序的醫療服務行業准入規則，讓有意願創辦醫療機構的社會資源，只要遵章辦事，就能夠順利進入醫療服務行業，這是最大的醫療服務行業供給側改革舉措。

放寬要素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例如，在土地方面，認真貫徹落實“非營利性民辦醫療機構可以通過行政撥款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規定。在資金方面，理清不同注冊形式的民營醫院的融資資格，鼓勵以合規合法的金融創新為民營醫療機構融資，鼓勵通過捐贈等慈善融資的形式為民營醫院提供資金支持。在稅收方面，對於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政府應當給予更大力度的稅費減免，以及必要的財政支持。在人才方面，通過適當的方式，將醫療教育資源、學術資源向非營利性民辦醫療機構開放（營利性醫療機構可有償使用），以此來促使高層醫療人才實現正常有序流動。

形成“優質優價”的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主張，按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進行分配，才是公平的分配原則。無論是為了壓低醫生收入來實現廉價的公共醫療，還是讓不法醫療機構通過坑蒙拐騙牟取暴利，都是對公平分配原則的踐踏。大幅提高專業醫療人員的服務價格，降低灰色收入，減少醫藥不合理加價。名义價格理順後，普通居民的醫療支出一方面要依靠醫保，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家庭醫生、分級診療等制度合理應用醫療資源，實現醫療費用的可控。與此同時，對於民營醫院的價格也不能一放了之，借鑒美國實行的按醫療服務代碼（ICD-9-CM）統一收費的做法，可能是解決辦法之一。

樹立公立醫院保基本醫療，民營醫院市場有序開放的辦醫理念。這实际上是處理好醫療服務的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性質的關係。中國政府已經明確，要“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指那些醫療衛生服務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並將其作為政府的基本職責由政府主導並負最終責任。這並不是讓政府出面，將醫療服務大包攬地背在公立醫院身上，而是由政府保障作為公共產品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醫療服務。在此之外，大量的醫療服務仍然屬於私人產品，民營醫院有著廣闊的空間，既可以參與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也可以為富裕人群提供高端服務，來填補公立醫院無法顧及的空白領域，通過提供市場化的優質醫療服務獲取經濟報酬。

建立透明的醫療服務評價監管體系和醫療機構退出機制。醫療監管要從事前、事中到事後，覆蓋醫療服務的全過程——從事前的宣傳廣告，到事中的診斷治療，再到事後的跟蹤服務，都應當受到監管部門或市場化中介機構的監督管理。患者應當得到適當的評價權，以此制衡医患關係中的信息不對稱和權利不平等。由公正的第三方對醫療機構給出評價，杜絕花錢買排名，花錢買口碑的各種形式的“醫托”，保證患者有充分、準確的知情權。醫療行業也要有明確的劣質醫療機構退出機制，及時將醫療界的害群之馬清除出去，才能起到充分的懲戒和警示作用。

嘗試建立醫療機構的競爭淘汰機制。長期以來，醫療機構缺少競爭淘汰機制，導致部分醫療機構壟斷一方“吃老本”。與其他行業不同，醫療機構的設立帶有一定的地域壟斷性，在申報方面也往往會做相應的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個地區平庸劣質的醫療機構無法退出，往往導致新的機構很難獲批，劣質機構以“非法承包”的方式“出租”壟斷的醫療“攤位”，不利於整體醫療服務水平提高。因此，應當建立醫療機構的競爭淘汰機制，主要從醫療質量、事故風險、患者評價等方面綜合進行評估，低於一定水平的醫療機構應予退出，為其他醫療資源的進入騰出空間。

醫療行業作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最為突出的領域，其實暗藏著巨大的改革空間。只要正確應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理，深入推進醫療供給側改革，醫療行業的整體服務水平就可以邁上一個新台阶！

府的銀行是不會垮掉的。誰來補充資本金？補充資本金只有財政部拿錢，再發債，那麼就是無中生有，那麼就是由廣大的老百姓來承擔今天的銀行壞賬。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所有的關係——中國經濟的朋友，都應該從這個層面來真正認識中國經濟的問題，要放棄這種貨幣信貸萬能主義的思維。當然，我們有一些企業家都是希望貨幣進一步的寬松，信貸進一步的寬松，他們好套現走人。有內地移民，已經用外國身份，現在就等著錢轉移出去了。這種高杠桿、高負債的風險總要以一種方式體現出來。今天中國房價如此之高，客觀來講，人民幣就面臨貶值的壓力，因為道理很簡單，一個國家內部出現資產價格的泡沫，出現通脹，你的貨幣必然貶值——要麼你的貨幣貶值，要麼資產價格調整，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問題。現在很多人討論，到底中國選哪一條路，是選擇貨幣貶值還是選擇資產價值大幅下調，還是這兩者都選擇一部分？我想這個調整是不可避免的，這樣的高杠桿、高負債的風險是中國今天面臨的最大的麻煩。這一次人民日報的權威人士也講得很清楚。有人講中國經濟面臨兩難——我們確實面臨最大的兩難，我們必須去去杠桿。但是去杠桿就必須放棄或者部分放棄所謂的稳增长。這一次明確的結論，去杠桿必須要去，就是一難兩難變一難就是下決心去杠桿、去負債。所以說得很清楚，僵屍企業該退出什麼退出，銀行該收債要收債，不要通過什麼債转股，又在玩這把把戲。

最後回到日前財經頻道小組會議：不能因為包袱重而等待，不能因為有困難而不作為，不能因為有風險而躲避，不能因為有陣痛而不敢。我想這是下了最大的決心了。所以我們都應該從這個角度來思考中國未來經濟政策的走向。（這是作者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資產的時代——2016 城市觀點論壇北京行”峰會上的發言，未經本人审阅。）(完)